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01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 2001 年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1

ISBN 7 - 80149 - 791 - 0

. 中... . 中... . 中国 - 近代史 - 文集 中国 - 现代史 - 文集 . 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368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01 年卷

编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文桂 杨 群

责任校对：齐 力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 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100732)

网址：<http://www.scl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22

字 数：556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791 - 0/K·115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 联大日常生活^{*}

吕文浩

引 言

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不少。这些研究大多着意于联大史上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教育思想，以及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治学风格等方面。对于联大师生所创造的战时教育奇迹，人们往往称羨不已。但是，在这期间，联大师生经历了多少物质困苦和精神不安，他们的感受如何，诸如此类的史实在严肃的学术作品里往往语焉不详，被一笔带过。人们要了解联大师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不得不求诸大量回忆录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文章的主题不同，加之年深日久，记忆误差，虽可略窥概貌，但未足视为信史。亟须对联大的社会生活史做出严肃的、系统的、学术性的整理。本文即是这种尝试之一。

日军空袭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

本文的写作承何兆武教授的勤勉及具体帮助，初稿写成后复蒙何兆武教授、闻黎明教授等诸多师友拨冗指正，二稿在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届青年学术讨论会上又得到许多批评意见，张振?教授细阅了三稿，多有指正。在此向各位师友一并致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com

中以1940~1941年为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疏，以至于消歇。在1940~1941年间，空袭确为影响西南联大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以往的西南联大史研究尚未对此进行专题性的研究，有关的论著和回忆文章对此大多谈得比较笼统，缺乏细致、准确的论述。本文力图重建空袭频繁时期西南联大围绕空袭而展开的社会生活详细的画面，评估空袭在联大造成种种物质损失、人员伤亡的同时，对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联大师生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克服困难，维持联大的弦歌不辍和较高的教育品质的。除了关注西南联大这个社会组织的品质以外，本文还试图呈现日军空袭威胁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生存政治的复杂内容，从而打破把联大各色人等视为一个整体，全都在面临生命威胁时从容不迫的迷思（myth）。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尝试着拓宽史学研究问题的领域，引起人们对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予以关注。

在切入正题之前，先对日军空袭与西南联大的防空状况略做交代。空袭是抗战时期后方城市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昆明的空防力量十分薄弱，名义上组编了高射炮团，实则仅有高射机枪两营。因武器口径小，有效射程短，武器数量不多而防护面积大，火力分散，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敌机在低空飞行以外，难以对高空投弹的敌机形成有效打击。在1941年12月18日飞虎队来昆明担任云南境内的对空作战任务之前，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在第一编的“校舍”、“迁校之议与叙永分校”、“三次从军热潮”三节分别叙述了有关空袭的若干史实；易社强的《西南联大史》（Jo Israe, Lianda, A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第271~276页“空袭”一节扼要地叙述空袭、警报的一般情况。这两种文献是对本题目学术性的研究，但还不是专题性的论述。其他回忆文章谈到空袭的甚多，因其探讨不是学术性的，故而大多较为笼统。

军手中。

昆明和联大在防空设施上比不上重庆，没有天然的优良防空洞，建造的防空洞也极为有限。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有一个小型防空洞，同时又说“西南联大也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在昆明，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成为战时的流行语。朱自清写道：“警报比轰炸多，警报的力量其实还比轰炸大。与其说怕轰炸，不如说怕警报更确切些。轰炸的时间短，人都躲起来，一点儿自由没有，只干等着。警报的时间长，敌机来不来没准儿，人们都跑着，由自己打主意，倒是提心吊胆的”。倘若要了解空袭在联大社会生活里的影响，跑警报要比直接遭受轰炸更为重要。因为跑警报持续时间更久，波及面更广，引起的人际关系变化更大。以下依次论述轰炸和跑警报对联大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

一 日军轰炸对西南联大的影响

敌机直接轰炸联大校舍者共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13日，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

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对象为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大，俯冲投弹，联大损失部分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震坏。该院的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房屋，仅稍震坏。此

《笛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5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朱自清：《论轰炸》，《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41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外，联大全体教职工、眷属和学生均未受到伤亡，翌日即上课。在这次轰炸中，清华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前后也遭到两枚落弹，幸而房屋建筑尚且坚固，仅仅玻璃窗、屋顶遭到相当损坏。办事处后院荒园内筑有一个简易的防空洞，用来存储重要卷宗，落在屋后的炸弹紧逼洞口，将防空洞全部震塌。经发掘后，发现物件损失不大，卷宗完好。最为不幸的是，躲避到防空洞里的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较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严重得多。这次轰炸使图书馆、饭厅、教室和宿舍都有损坏，当时正值暑假，抗战时期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们无家可归，一年四季都呆在联大，为了解决住宿问题，现存的教室多改作宿舍暂用。一位学生描述当时的情况写道：“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便在此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在寝室睡觉也要张伞，真别致！”

1940年6月，日军进占越南，云南局势顿形紧张。联大曾有迁校之议。因学校规模大、人数多，迁移起来十分困难，便先在四川南部的叙永设立分校，1940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在那里上课。后来局势缓和，校方决定1940年下半年叙永分校撤销，全部学生在昆明上课。被炸当天，联大校方给叙永分校发电报，“急，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昆市连日被炸，本日本校新旧校舍被炸房约200间，分校员生来昆无法容纳，请转知暂缓启行”。

当时，梅贻琦常委不在昆明，正在重庆接洽校务。8月23日他才回到昆明。8月27日下午召开联大常委会，他看到新校舍被炸后没有计议修复事宜，有人在会上提议延期开学，“心中

光远：《片段的回忆》，《联大八年》，第67页，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
西南联大关于校舍被炸电叙永分校（1941年8月1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6卷，第271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大不为然”。决议赶快筹备，设法如期开学。具体的议决事项有三条：“（一）本大学各部分此次被炸毁之校舍，无论租用或原属本校者，倘不需购置大宗材料，或有现成材料，经加工修葺后即可应用者，应即尽速修理。通知（二）本大学应即由总务处会同校舍委员会主席黄钰生先生尽速于昆明市区内或市区附近觅定房舍备作校舍之用。通知（三）本大学倘能于最短期中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觅定校舍，足敷应用，本学年本校各院系应仍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上课。通知”梅贻琦显然在决定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经校方人员的多方努力，仅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劫后创伤已全部修理完竣，屋宇焕然一新，而学校当局原定的开学日期，得以如期举行。9月29日、30日两日，二、三、四年级注册，远在叙永的一年级同学也早已首途，到9月30日前已到了十之八九。10月6日在开学典礼上，梅贻琦常委做了一个简短精警的报告，他说，8月14日本校遭到轰炸，校舍损毁甚巨，同学间各自推测，以为决不能如期开学，最早当在12月初，留昆同学自己懈怠之不足，复致函返籍同学告以此种聪明之推测，阻其准期返校，此种心理实在最要不得。据1946年初《申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某一暑假中，学校被炸，梅先生（指梅贻琦——引者）亲自提着汽油灯，日夜赶修，卒能如期开课，可证明他们办学的精神了”⁵，文章中提到的“某一暑假”，揆诸史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9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常委会第187次会议记录（1941年8月27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191页。

参见《联大被日机狂炸后秋季如期开学梅贻琦作精警报告》，《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1937～1945），第4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沈石：《西南联大群相》，收入《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1937～1945），第507页。

实，应指1941年暑假无疑。由此段所叙述的史实，我们不难间接地判断出8月14日轰炸造成的损毁是何等的严重，联大校方为赶修校舍做了多么大的努力。

在此还需要补充叙述一下轰炸对联大师生人身伤亡和物质损毁的情况，以及校方的若干应对措施。

在轰炸中，昆明市民不时有数十、数百人伤亡，在《吴宓日记》和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的《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里屡有记述。综合各种材料，联大师生含眷属由空袭直接间接造成的人身伤亡，估计大约是死10人左右，伤10人左右。《浪迹十年》引述防空司令部的统计数字，自1938~1941年，昆明由空袭造成的死亡数为1044人，伤者数为1414人。比较一下，联大的伤亡数应该还是比较小的。推究其原因，大抵是由于以下两点：一是联大校舍位于城郊，疏散远较市区方便，二是联大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体力充沛，较短时间内疏散五六里地乃至七八里地不感到困难。

常委会第166次会议（1941年1月8日）议决：本校教职员因空袭受伤，所须治疗费用，由学校设法补助，学生因空袭受伤，应由学生空袭救济金中拨付。常委会第167次会议（1941年1月15日）梅贻琦主席报告：本校同人因前数次空袭所受到损失的情形，并已成立本校同人遭受空袭损害救济委员会，聘郑天挺、潘光旦、冯友兰、吴有训、黄钰生诸先生为委员。常委会第177次会议（1941年5月21日）上，议决事项里有总务处函请在以前拟订的教职员空袭损害救济费标准之外，请本校同人遭受空袭损害救济委员会再就直接炸毁和因震受损议定标准。在常委会179次会议（1941年6月4日）上，议决：此后本大学同人因空袭遭受损害时，其因私物被毁向本校请求救济者，应以居处直接中弹或临近中弹而居处倒塌或燃烧，致个人财物遭受损失

者为限。

由于资料不完整所限，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出联大师生遭受轰炸得到救济的详情，但可以肯定的是，空袭对教职员的居住环境带来了不少麻烦，使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蓬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⁵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 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引者）和岱孙（指联大经济系教授陈岱孙——引者）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联大历史系教授——引者）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联大数学系教授——引者）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分别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164、165、176、179页。

《吴宓日记》第7册，第251页，三联书店，1998。

《吴宓日记》第8册，第21页。

5 《吴宓日记》第8册，第79页。

《吴宓日记》第8册，第86~87页。

轰炸除了直接的物质损毁和人员伤亡以外，也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首先，敌机轰炸增加了物价的上涨速度，进一步恶化了联大师生的生活状况。昆明的物价本来是很低的，抗战军兴，成千上万的沿海省份的难民涌入昆明，这些人带来的国币在和滇币兑换方面占有优势，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消费，昆明本地人都说物价就是这批人抬高的，从而对涌来的难民相当头痛。每当战局逆转昆明必然同时受到灾殃，对人民日常生活受到的最大影响是物价不断上涨。北大校长、联大常委蒋梦麟写道：

物价初次显著上涨，发生在敌机首次轰炸昆明以后，乡下人不敢进城，菜场中的蔬菜和鱼肉随之减少。店家担心存货的安全，于是提高价格以图弥补可能的损失。若干洋货的禁止进口也影响了同类货物以及有连带关系的土货的价格。煤油禁止进口以后，菜油的价格也随之提高。菜油涨价，猪油也跟着上涨。猪油一涨，猪肉就急起直追。一样东西涨了，别的东西也跟着涨。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据联大经济系杨西孟教授的统计，自1938年下半年以来昆明薪津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生活费指数的增长，致使薪津实值急剧降低。物价上涨之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因为物价上升速度与空袭频率并不完全成正比例变化，但是空袭显然是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

蒋梦麟：《西潮》，第207～20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参见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卷，第561～562页。

其次，许多教授为避空袭，举家疏散乡下，物质生活更加清苦，每次进城出城往返费时。

王力教授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文中谈到1939年为了避免空袭的危险，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灯。无可奈何之中，勉强找了一个点菜油灯的理由，说是电灯比不上菜油灯有诗意，聊以自慰。还说电灯像一切的物质文明，在增进人类幸福的同时，也添加了社会的罪恶，它能使人奢，能使人淫。这点自我欺骗的理由自己也是很清楚的——“无非因为我享受不着电灯。葡萄并不酸，但是，吃不着的葡萄就被认为酸了”。在乡下住了一年多，他听到村里有装电灯的机会，欣喜若狂，但是装电灯的代价实在不小，显然是被菜油灯搞得困苦不堪，王力居然破费装了一盏电灯。他写道：“我住的房子距离电线木杆五十公尺，该用电线二百余码，计算装电灯的费用，是房租的百倍。我居然有勇气预支了几个月的薪水以求取得这一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东西。于是瓮牖绳枢，加上了现代的设备。每一到了黄昏，华灯初上，我简直快乐得像一个瞎了十年的人重见天日。那个一年来的良伴菜油灯，被我抛弃在屋角上，连睬也不去睬它了。”

疏散到乡下使教授们到校极不方便，费时费力。据冯友兰回忆，当时疏散在乡下有两个中心，东郊是龙泉镇（距城大约十七八里地），西郊是大普吉，这两个地方住的联大教授很多，很自然地形成了文化中心。物理系教授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新校舍约有20公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就进教室，保证了按时上课。吴大猷疏散在昆明北门外5公里外的岗头村，他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话》，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话》，第117页。

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99、102页，人民出版社，1998。

说：“从岗头村步行到学校，要一小时，我住在岗头村早上五点多钟起程，六点三刻左右到学校。有时刚刚到走到学校，便逢着警报，立刻又要赶回岗头村。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廿里，不几天便要打掌。”

疏散还会有特殊的麻烦。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毁坏了费孝通在文化巷的住所，14日他便疏散到呈贡县古城李保长家租住，一住就是5年。他租住了一间厢房，厢房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一半是它们的猪圈，楼板的材料是结实的，可是板与板之间的缝却没法拼得太紧密，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的气味可以上升到厢房里来。厢房靠院子的一半板壁还没有起，只用草席挡着风。他希望两件事：把猪圈搬开，把板壁起好。交涉了半天，只是把板壁这一件事做到半件，至于猪圈，则没有任何进展。房东说养猪的收入比全部租金大好几倍，出租房子是为了交情，而且带一点救济难民的性质，并不等钱用。费孝通更大的麻烦是住了不久以后，房东出乎意料地给了他一个警告：他的孩子决不能在这里出世。房东绝不是有意为难他，仅仅是为了遵照当地的风俗，据说一家人的住宅，若被别人家的孩子的血光一冲，则殃及这家人的子子孙孙。费孝通本已请妥了一位相熟的助产士来乡下接生，这一计划不得不放弃。政府虽有明令，郊外房东不得刁难疏散居民，尤其应保护孕妇，但是乡下人碍于风俗不准在他家生育也有他们的道理。费孝通转而求助于卫生院，不巧的是卫生院设在该县的圣地文庙，在其成立之初，就已接受了人民的要求，绝不容留产妇。此事真是急得费孝通团团转，最后不得已找到县城的一位广东太太，以5元一天的代价，租了一间白天黑得看不清钞票数字的房间，孩子总算可在屋内出世了。

吴大猷：《抗战期中之回忆》，《传记文学》第5卷第3期，1964年9月。

参见费孝通《疏散——教授生活的一章》及《疏散与生育——致某杂志编者的信》，均收入《费孝通文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9。

1941 年底以后，空袭渐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不少疏散在乡下的教授陆续搬回城里，但此时昆明物价上涨，房租上涨，也有一些教授还留在乡下居住。

二 联大师生的跑警报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警报有三种。一是预行警报，表示敌机刚刚起飞，表示方式为在五华山上悬挂 3 个很大的红色气球（一说为在市区醒目的地方挂一个大红灯笼，解除预行警报时挂两个大红灯笼）；二是警报，表示敌机飞入云南省境内，表示方式为拉一短一长的汽笛，呜—呜——呜—呜——；三是紧急警报，表示敌机已经飞入昆明境内，表示方式为拉连续短促的汽笛，呜—呜—呜。警报在那个年头是人们很熟悉的生活常识。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联大的师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才动身。1941 年 1 月 9 日，《梅贻琦日记》上记述道：“上午 9 点有预行警报，到办事处后，见办事员有先自离去者，严予告诫。”原因是联大的校舍位于市区的西北和东南，东南部是在拓东路的工学院，其余校舍均在西北部。这两处校舍都在城郊，跑警报比较方便。由于预行警报不跑，何兆武先生说他不记得预行警报是以什么方式来表示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去关心预行警报。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西北校区的师生一般是到城北或城西的小土山上去躲避。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说是漫山

参见费孝通《疏散——教授生活的一章》及《疏散与生育——致某杂志编者的信》，均收入《费孝通文集》第 5 卷。

《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 3 页。

2001 年 6 月 2 日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

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

联大中文系1939年入学的汪曾祺回忆道：“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警报时间经常是很长的，不总是那么新鲜有趣，也很“腻味”。易社强教授写道：“起初，学生们对空袭泰然处之，他们喜欢坐在阳光下，与朋友们闲聊，打桥牌，或是读书。后来随着警报越来越频繁，时间越来越长，漫长的下午呆在乡村就是一件怪腻的事儿了。在那儿呆在户外就意味着吃不上午饭，而学生们几乎都没有钱向当地的农民买东西吃。”何兆武先生说，那时学生大多很穷困，很少人有手表，他们便在地上画一个日晷大致推测时间。

前面说，跑警报时最常见的消磨时间办法是闲聊、打桥牌或是读书。这几种人都会有的。特别勤奋的人会觉得跑警报太浪费时间，往往夹一本书看，吴宓在日记中提到他在避警报的过程中，在野外读的书有《维摩诘经》、《涅槃经》、《佛教史》等。不过跑警报最方便最自然的方式还是闲聊，吴宓跑了几年警报，大都是以闲聊消磨时光，读书的记载很稀少，所提到的书也仅限于前面提到的那3种佛教书籍。跑警报时间长了，个人都有比较固定的地点，所遇往往是熟人，跑警报也就成了大家聚谈的好机会。费孝通写道：“而且，疏散时，大家都觉得逃过工作是应当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第3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John Israel,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p.272.

2001年7月27日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

的，反正在旷野里也没有工作可做。有时我还带本书在身上，可是心里总究有点异样，念书也念不下去。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闲谈了。”

跑警报时，大都要把一点值钱或自己珍重的东西带在身边，是所谓“警报袋”或“疏散袋”。据汪曾祺记述：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金岳霖先生抗战时写完了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一书，有一次空袭警报时，他把书稿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自己就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回去，把书稿忘在那里，等到记起来时再回去找，已经找不见了。后来，他只好把几十万字的书又重写了一遍。《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不慎丢失，他当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跑警报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研究秩序。根据空袭的紧张与松弛程度，联大多次调整上课及办公时间，大致是上午7~10时、下午3~6时上课办公，力争减少空袭带来的损失，其效果是良好的，因为昆明的警报一般是上午10点钟左右来，午后解除。早晨7~8点钟或晚上来警报的次数很少。

要说跑警报对师生的学习研究工作负面影响不大，是不大符合实际的。据联大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以联大学生而论，若每人每学期选读40学分，每周上课20次，每次40分钟，跑警报所费时间，约等于两三周的

费孝通：《疏散——教授生活的一章》，《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271~272页。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卷》，第365页。

《知识论》作者的话，收入刘培育编、金岳霖著《哲意的沉思》，第34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上课时间或一个半学期。倘若我们再把此前此后（即1940年5月12日之前和1941年12月24日之后）跑警报花费的时间也算进去的话，估计跑警报所费时间，应约相当于两学期多一点。冯友兰在《联大被炸以后》一文里说，跑警报占用时间较多，是学生读书空气淡薄的原因之一。1939年入学的联大经济系学生叶方恬写于1945年的文章说：“上课的时间是缩短了，重要的图书和仪器疏散了。极度疲乏的时候念书效率的锐减也是意料中的事情”。陈达的《浪迹十年》里有一条“社会学系学生读书报告”（写于1943年1月7日）说抗战以来，大学生的英文程度愈见降低，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学程度受战争影响渐行降低，二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因书籍缺乏，空袭频仍而课程欠严⁵。

三 跑警报：心态、心理效用及其人际关系的微妙变化

联大师生面对空袭警报，做何反应？综合各种资料，可以看出大体上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所谓因时而异，指的是初期和中后期之别。初期因对敌机轰炸规律尚不清楚，跑警报也没有经验，心理没有把握，自然容易慌乱，别人紧张自己也跟着紧张，此时笼罩群体的气氛是惊慌和逃命要紧。甚至谣言的流播也容易调动起大家的情绪，引起大家的行动。钱穆在《师友杂忆》里曾生动地记述了联大7位教授初期遇到空袭谣言时的反应。当时是在蒙自，联大大部分师生已迁回昆明，钱穆、汤用彤、吴宓、沈有鼎等7人租住城外的法国医院，准备在几个月后昆明开学后返

陈达：《浪迹十年》，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46。

冯友兰：《联大被炸以后》，《当代评论》第1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

叶方恬：《苦难中成长的西南联大（外三章）》，原作于1945年5月1日，收入《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1988。

5 陈达：《浪迹十年》，第307页。

校。此时，传言将有空袭，引起了7位教授如下的反应：

沈有鼎自言能占易。某夜，众请有鼎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检之，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随带面包火腿牛肉作午餐，热水瓶中装茶解渴，下午四时后始归。医院地甚大，旷无人居，余等七人各分占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指吴？——引者）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

其他关于初期遇到警报或传言时人们惊慌的记载，亦复不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后来，人们对敌机出没的大致规律和破坏严重性的可能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跑警报也更有经验了，此时便不像初期那么惊惶失措了。情绪反应趋于平和，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疲”的成分。适应性提高了，反应的敏感度也就随之降低了。

所谓因人而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里曾写过一段很有趣的话：“生活历史不同的人也不容易对于一个象征有相同的反应。一个曾在炸弹下逃过命的人和一个从来就没有见过敌机的人，对于警报所有的认识在程度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不但甲无法使乙同感他恐惧惊惶之感，而且警报所引起的行为反应在甲乙两人也不易相同。甲认为非走出二十里躲在山洞里不能安心，而乙却可以据床高卧，满不在乎。这两人就不能合作一同跑警报。”有人可以心理十分紧张，“逃警报”；有人满不在乎，连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218页，三联书店，1998。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134～1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